



于惠芳 朱志勇 主编

中国社会的运行与变迁： 理论与诠释

ZHONGGUO SHEHUI DE YUNXING YU BIANQIAN
LILUN YU QUANSHI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社会的运行与变迁： 理论与诠释

于惠芳 朱志勇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的运行与变迁:理论与诠释/于惠芳,朱志勇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7-301-10900-8

I. 中… II. ①于…②朱… III. 社会变迁—研究—中国—现代
IV. 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1007 号

书 名: 中国社会的运行与变迁:理论与诠释

著作责任者: 于惠芳 朱志勇 主编

责任编辑: 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900-8/C·042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252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主 编 简 介

于惠芳，副研究员，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为信息管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著有《图书馆目录》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一版）编委。1996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助理。2000年起专职从事科研和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工作，发表过《加强能动性管理、促进学科优势形成》等文章。

朱志勇，哲学博士，香港大学华正中国教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育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社会研究方法论、教育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英文专著1部（即将出版）、译著1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20余篇文章。

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代序)

刘世定*

2004年5月12—13日,北京大学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全国博士后‘中国社会的运行与变迁’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我做了一个题为“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的发言。在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出版之际,将那个发言中的部分内容加以修改以为序。

一、学术自觉

前几年,费孝通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就是“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引起学界许多人的思考。我在这里试图讨论的“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问题,也是在费孝通教授的“文化自觉”概念的冲击下引发思考的产物。如果把对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看作一种文化活动,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视为“文化自觉”的一部分。

在讨论“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先对我理解的“学术自觉”作一交代。

对于什么是学术和学术活动,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我在这里不准备对各种理解做出系统的梳理和评论,而只是想说明我们在这里所指的是什么。说到学术,我们这里指的是系统化的知识;学术活动,则指追求系统化知识的活动。

当我们对学术和学术活动做了这样的界定之后,可能会面临一个非难:既然学术是系统化的知识,既然学术活动是追求系统化知识的活动,而系统化过程是一个离不开自觉思考的过程,那么,“学术自觉”似乎是一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个多余的概念，是一种用语上的冗赘。

不过，我们要讨论的学术自觉并不是在系统化的过程中的自觉思考这个层次上，而是指要把学术活动自觉地作为学术活动来对待。也就是说，在我们从事的被称为学术的活动中，自觉地把系统化的知识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把学术活动界定为追求系统化知识的活动，事实上是提出一个理想型。理想型是抽象的，而现实中的学术活动比理想型中的学术活动要更加复杂。投身于现实学术活动中的人可能怀着学术之外的各种各样的目标来做学术，比如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娱乐目标等。所以我们在现实的学术活动中不仅可以看到其他一些目标的介入，甚至也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种类的自觉，如政治自觉、经济自觉等等。

在现实的学术活动中引入一些其他目标，存在一些学术之外的自觉，不一定就会对追求知识的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有时抱有这类目标和有学术之外的自觉也会增强人们追求知识的动力。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要取决于具体的学术目标和其他目标的关系，以及非学术的自觉和学术活动的具体关系。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在学术活动中没有学术自觉，那么可以肯定，这样的“学术活动”一定是做不好的。特别是在没有学术自觉而又存在着非学术自觉的情景下，学术活动更会被引入歧路。

二、学以致用和学术自觉

“学以致用”是近代以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理念，甚至形成了一种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许多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和追求。在这样的理念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在从事学术活动中没有学术活动之外的目标。

这样的理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对中国的学术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复杂问题，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在这里只是想谈一点初步的看法。

“学以致用”是一个成语，本身不是一个经过精确界定的科学概念，人们在使用它乃至把它作为原则来加以实施的时候，事实上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将其理解为关于知识追求和利用其造福人类这两者间总体关系的一种信念。也就是说，以造福人类作为追求知识的基本信念，但并不一定要在自己此生此世见效。我们知道，费孝通教授是很强调学以致

用的，但我们也同时看到他近年讲生死、永恒和文化的时候很强调个人一生中的“立德、立功、立言”进入“文化体和社会体，因而不朽”（费孝通，2004：179）。联系着学以致用来考虑，我觉得这里具有前面讲的那种总体的信念。

另一种对“学以致用”的理解是，知识的追求必须要在自己手里发挥其有用的效力，必须要把知识追求和个人在知识之外的现世目标实现联系起来，即为这样的目标实现而学，否则就没有意义。这是一种狭窄的理解，但确实是相当流行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学以致用作前一种理解，那么对学术事业的发展是积极的。它既使我们在发展学术的时候不至于忘记终极目标，也不会带来短视的行为。但是如果作后一种理解，那么，对学术发展来说存在的负面作用便不容忽视。它非常容易导致学术活动中的急功近利，使人们不在基础研究上面着力，而在一时看不到学术活动对自己有什么学术之外的用处的时候，很自然会放弃学术追求。

再来看“修、齐、治、平”的理念。长期以来，这样的理念在推动知识分子关心现实社会，推动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精神财富。但是从发展学术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理念的局限，不能不注意到其中包含着对学术活动来说非常致命的危险：它容易使知识分子由知识追求走向折服政治权谋，鄙夷艰苦而时常不见成效的知识探索工作。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知识追求和政治运作上的成功并不是一回事。

因此，从发展学术的角度着眼，在有“修、齐、治、平”的深厚传统，而狭窄的学以致用观念又十分流行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有必要强调学术自觉。对于身在学术界从事着学术活动的人来说，尤其需要这种自觉。

三、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以遭遇西方的军事、政治、学术冲击为背景，曾出现了著名的关于“中学”和“西学”的辩说，辩说的中心指向之一是所谓“为体”、“为用”问题。我们且不论以今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学术讨论标准来看，在这个辩说当中存在的诸如使用的概念是否清晰、推论是否合乎逻辑等问题，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辩说事件本身，那么我们不难体会到在这个辩说当中当事者所感受到的中国主流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这里

触及了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征的思考。不过在对“中学”和“西学”的辩说中,当时并没有把重心放到对中国社会进行学术研究上面。它的着力点是思想体系层面的碰撞。

20 世纪初期,一些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曾试图把大学建成“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园地。比如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以后,针对当时学生的观念,在第一次演讲中就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蔡元培,2005)。此后,按蒋梦麟先生的说法,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在北大蓬勃一时(蒋梦麟,2005: 11)。不过,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行动取向很快压过了研究学术的取向,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主义”迅速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在总体上被一种深深的救亡氛围所笼罩。思想最活跃的知识分子都试图从国外找到行动纲领。虽然在他们当中有向欧美国家学还是向俄国学的分歧,但在总体倾向上是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学习它们的理论和制度建构。

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涉及了外来的理论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也就出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的问题。不论是政治实践者,如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学者,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并且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从主流精神来看,具有相当高度的社会实践自觉或者政治实践自觉,但是若论学术自觉,却相对较弱。这是很自然的。那时,中国当下的出路问题现实地摆在面前,容不得人们从容地讨论学术。

事实上,在运用来自国外的理论于中国社会的时候,政治实践者和社会研究者们都遇到了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实践中就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社会学界,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有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议题。我认为,这个议题是中国社会研究中开始具有学术自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虽然我对其其中的一些观点乃至“社会学中国化”这种说法持批评态度。

尽管中国学术界在中国研究中很早就具有了某些学术自觉,但这种自觉性的发展却并不顺利。除了前面提到的民族存亡的紧迫情势之外,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理念、制度因素都对其产生了制约作用。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社会学在高校课程中被取消到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科学研究近乎绝迹,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也微弱到极点。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的

研究再度兴起。这种研究的最初动因是为了解决改革和开放所面临的诸多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在为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而研究中国社会的同时,对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给予更高的重视,学术自觉性有了极为显著的提升。如果联系早期的学术自觉来看,那么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变化可以说是中国研究中的学术自觉的一个复兴。这一复兴的标志不仅是重新提起“社会学中国化”的话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讨论,而且是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自觉地把自身融到人类共同的文化体系里面去考虑。比如,我们看到,在立足中国的现实进行研究并结合国外学者的理论进行讨论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说法是“对话”,而不是简单地讲来自国外学者的理论适用还是不适用。这种话语的变化体现着学术理念的转变。这种学术自觉在许多青年学者的论文和著作中,包括许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都可以看到。

当然,今天我们强调中国社会研究的学术自觉,并不是想把它和中国知识分子中具有的社会实践自觉和政治实践自觉完全对立,绝对排斥。在这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关系,要经过长期努力。事实上,这也是形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传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博士后研究人员肩负重任。

参考文献

- 费孝通(2004):《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群言出版社。
- 蔡元培(2005):《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第 1—8 页,长江文艺出版社。
- 蒋梦麟(2005):《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代序)	刘世定 (1)
------------------------	-----------

第一编 文化、价值观与社会转型

“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重构	方李莉 (3)
论社会文化的变迁与知识资本的形成	蒋南平 (17)
组织性个人主义: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 福利文化	刘继同 (30)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史学	刘 墨 (50)
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分析	周 浩 (60)
居民生活休闲化的制度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 变迁的一项研究	刘晨晔 (76)
福音或灾难:当下消费社会研究的理论反思与 实践探讨	郑红娥 (90)
沪、港、台三地文学类畅销书中价值取向的 社会学分析	朱志勇 刘 叶 (106)

第二编 经济、组织、产业与社会发展

清代商业社会秩序自在自为性之研究	孙丽娟 (121)
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与评估体系的转型	李 岚 (137)
经济类社会团体的赋权模式与职能导向的 选择	徐家良 (155)
受众:市场、商品与意义生产者?	臧海群 (166)

第三编 教育与社会变迁

全球化的两重性与大学通识教育的文化

对策 杨杏芳 (185)

职业校长人力资本定价研究 苗庆红 (192)

中国大学制度变革:新制度主义分析

——以 2003 年北大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

制度改革为案例 罗 燕 叶赋桂 (203)

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了吗? 凡 庸 范晓慧 (219)

编后记 (228)

第一编

文化、价值观与社会转型

“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重构

方李莉*

21 世纪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将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那就是必须使自己的国民经济加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同时也必须使自己传统的地方性文化适应新的世界性文化的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方人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制造了一个统一的人工化的物质环境,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大新的文化环境。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怎样去适应这样的环境,也就是如何走向全球一体化,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各自的文化基础不一样,各自文化发展的初始条件也不一样。

不仅如此,就是西方国家本身也还没有适应它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新的物质环境,也就是说,当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没有真正的协调一致,新的物质文明需要有一个新的精神文明、一个新的文化观念、一个新的道德标准,但到现在为止,这个新的精神文明还没有真正跟上来,还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在全球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时听到一些唤起种族和民族情感的疾呼。这些力量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根本上来讲,它们都代表了一种在失范的和混乱的世界上寻找归属的渴望。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个世界的文化发展是不和谐、不平衡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些落后的非西方国家有自己本身的文化传统,但这些文化传统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他们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去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第二个问题就是,西方社会也要面临如何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相互协调,避免造成各种文化的对立化,以保证整个世界能和平相处下去。其结果就是,各民族都要面临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去认识每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的问题(费孝通:2001:11)。基于这样一个思考背景,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

*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员。

觉”的理念。

在新的世纪里，“文化自觉”将越来越成为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在今后社会发展道路上所要遇到的重要问题。怎样认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怎样认识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到世界的文化生态如何保持平衡发展的大问题。本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生态的构成》，文章里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正使得生物圈内的生物在急剧地递减，同样，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也正使得文化圈内的文化种类在急剧递减。也就是说，人类现代的物质文明是以生物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而人类现代的精神文明却是以文化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我们现在感到的是自然生态的被破坏，自然资源的在减少，但同样我们将面临的还有一个文化生态的被破坏和文化资源在减少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不但坚信自己的看法，而且还感到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好转，还越来越严峻，里面蕴藏的许多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和尖锐化了。联合国已提出要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在这里，我想再一次以生物学的例子来阐述我的观点。

目前人类在自然界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生物入侵”的问题。记得在 140 年前，有移居者到澳大利亚，当时他们带了 24 只兔子，最后有 13 只在草地上放养。由于在澳大利亚的草原上，没有老虎、狮子、豺狼等这类的食肉动物，兔子没有了天敌，于是迅速地繁殖起来，最后竟然由最初的 13 只繁殖到六亿只，吃掉了澳大利亚大量的草地，弄得人们束手无策，只得从另外的地方引进豺狼，以控制兔子的无限制的繁殖。最初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但现在类似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灾难。

再举一个例子，在中国有一种鱼，叫黑鱼，学名黑鳢，也俗称乌鱼。这种淡水鱼一向是中国人盘中的佳肴。但几年前它们“偷渡”到美国，在大洋彼岸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在美国的江河中，它性格凶猛，大量捕食美国河流中的鱼类，而且繁殖力强，侵占当地水域中其他肉食鱼类的食物资源，在黑鱼灾害最严重的马里兰州，一些河流中原本繁盛的鲑鱼已经绝迹。美国人把黑鱼称之为“地狱之鱼”。（《北京晨报》2002 年 7 月 29 日）

最近《工商时报》（2002 年 6 月 7 日）有一个报道说，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出现了一种“飞机草”，这种“飞机草”一旦入侵草地，其他草就会受到抑制，每亩地“飞机草”产量能达到 5 200 多公斤，而可食畜牧的草每亩仅生

产9.2公斤。由于这种“臭草”迅速蔓延,但不知从何而来,像是从飞机上撒下来的,所以被群众称为“飞机草”。只要“飞机草”侵占了草场,争阳光、争水分,一般杂草大都会被排挤出局,两三年草场就会失去利用价值。专家介绍,“飞机草”本名紫茎泽兰,原产于中美洲,约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从中缅、中越边境传入云南南部,70年代末传入四川凉山州。

以上的例子就是生物入侵的例子,所谓的生物入侵,就是一个物种到一个新空间侵占了本地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以及本地物种的生态位,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资源,影响本地物种生存,并通过形成大面积的优势种群,降低物种的多样性,使依赖于当地物种多样性存在的其他物种没有适宜的息栖环境。这种入侵物种不仅能大量利用本地土壤、水分,导致本地水土流失,还能影响本地景观的自然性和完整性。

如今世界交流日渐频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与旅游的大幅度增长,为物种的偶然或有意的传播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机会。一次次飞机航班、一艘艘远洋轮船、一位位在各大洲之间跋涉的旅行者,都有可能携带着物种“登陆”一个陌生的环境。每辆卡车、每艘轮船、每架飞机都是潜在的携带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到生物入侵的危害。目前中国有外来杂草107种,外来害虫32种,外来病原菌23种。中国每年用在治理生物入侵所带来的灾害上的花费是570亿人民币,而美国则是每年1500亿美元。这些外来生物的入侵给生态环境,生物的多样性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

为什么兔子在其他地方生长得很正常,到澳大利亚就成了一种灾难;中国的一种普通食用鱼到美国却成了“地狱之鱼”;还有紫茎泽兰本是中美洲的一种普通杂草,到我国的西南地区就成了不可制止疯长蔓延的毒草呢?那是因为,在自然界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生物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将各自的种群限制在特定的栖息环境,形成了稳定的生态平衡系统。这种关系在一定的地域是相对稳定的,但如果其中有某个物种到了另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新的环境中,没有一个可以制约它的天敌,它就会成为一个有害的“外来者”,使当地原本脆弱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这就是中国所谓的一物降一物,任何生物都是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平衡的生态环境。

我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描述生物中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要想说明的却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那是因为我覺得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人类是否也在遭到一个“文化入侵”的问题。当然生物现象不能够等同于文

化现象,但按照儒家“天人合一”的观点,人通过悟性可以直感地把握天道。天道、天理都在人的经验之中,不在人类之外。天参与人事,人亦参与天地之化育(俞荣根:2001:642)。也就是说天道可以与人道相通,天道中的许多现象也可以给人道许多的启迪。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我们总习惯把科学技术和文化分离开来,认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它像武器一样可以由不同文化的人来掌握。所以在20世纪初的中国洋务派们便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点,觉得我们可以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要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可以掌握的,用来征服自然,用来发展经济的武器。实际上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有机的整体文化系统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一种文化也就是一种有机的自成体系的环境系统,像生物一样它有自己平衡发展和相互制约的机制。

就以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来说,我们对它的认识应该是一种整体的认识,应该了解到其文化是作为一种整体的系统在技术的基础上或至少是在功能上适应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我们以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总是要使其技术与文明、基础与上层结构分离开来。

但事实上,正如胡适所认为的,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高度精神的(周昌龙,2001:721)。所谓的高度精神,自然是合物质的而非隔绝于物质之外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中本来就有“器”“道”不离的说法,所以说,洋务派以重“器”的变通谋求守“道”的捷径,实际上是割裂了文化的整体功能。因此,对一种文化的引进必须要注意其整体性,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发生类似“生物入侵”以后的灾难性后果。

从15世纪末起,西方文化就开始向全世界扩展,最初的扩散是以贸易和殖民为主,以海洋为纽带,是初步的、零散的。以后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以及交通与通信手段的革命,跨国公司出现了,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开辟、争夺原材料和市场,世界经济体系随之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兴起,全球性联系发生了跨越时空的革命性变化。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市场经济及其价值体系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西方国家机器跨国公司主导的市场经济将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卷了进去,触一发而动全身。西化已经达到了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程度。实际上,现在风靡的经济全球化也就是全球西化的代名词。